

流星

Liu Xing

杨 旭



流 星

杨 旭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0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 9/16 插页2 字数15000

1990年6月第1版

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8,000

ISBN7-5306-0549-0/I·478

定价:2.85元

序

忆明珠

几年前，我曾为杨旭的报告文学集《检察官——汤铁头》，写过一篇《书后》，说到我对杨旭的作品的感受，也说到我那时的心境。回头看来，那时的我，怎么回事啊！好严肃，好严峻！脸儿绷得紧紧的、板板的，无一丝笑意，不会笑，笑不出。好像在高擎双手扶正乌纱，恭候圣旨一到，马上就要去辅佐明主整饬朝纲似的，尽管我连个芝麻绿豆大的官都不是。想想当年那副自作多情的样子，很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
现在《流星》即将问世，这是杨旭的第二个报告文学集，他仍要我为这本书随便写上几句。说：这次就叫作《序》吧。由《书后》而《序》，对于我的文字无疑是优厚待遇和破格提拔了。其实，我肚里有数。我的《书后》，只堪垫底；《序》，等于增多了扉页。它们被彻头彻尾地用来给杨旭的大作当包装纸了。然而，这一次，情形有点变化。因为我发誓要革面洗心，重新做人——学笑。学做鬼脸，学嬉皮笑脸。决非越严肃、越严峻越好。“笑一笑，十年少。”过去笑不出，勉强做笑，反笑出一脸苦相，人变得未老先衰。

现在我可不算“先天下之老而老”了，真想来它个“一笑人间万事”，并决定致力于斯。而这时杨旭走来，要我为他的《流星》写《序》，我不由暗笑他对我太缺少提防，不怕我写着，写着，把我刚刚学来的笑，刚刚学来的鬼脸、嬉皮笑脸，写进《序》里吗？

或许杨旭不在乎这些。朋友之间，谁出了书，请哪位在书前书后赞言几句，互相都是一种珍贵的纪念。我跟杨旭是老朋友，很谈得来，所谓“臭味相投”。但我还不敢自认跟他同属“一丘之貉”。要知道，杨旭，他姓杨，他自己曾说过：“我是杨家将！”倒也有点像，因为这位“杨家将”，好谈兵。什么滑铁卢之役、珍珠港偷袭、火烧赤壁、淮海大战……古今中外许多著名战例，他都谈得头头是道，历历如见，好像他兼充过对战双方的高参。太凡好谈兵的人，依我的臆断，往往富于阳刚之气，好动、好奇、好捕捉机会，好开拓扩充。这几年，杨旭大大拓宽了他的生活视野和文学活动场地。他经常象以往谈兵那样，饶有兴味地跟我谈论什么体制改革、科技动态、海关外贸、金融股票……他的战线拉得很长，从陆地拉到水上，并曾相当精到地考察了长江和运河的历史与现状。在神州大地上，长江，这条最长的自然河流，成东西向的一横；而运河，这条最长的人工河流，则成南北向的一竖，恰如一个平摆着的“十字架”。我不知道这跟我们这个古老、伟大又多灾多难的民族有何纠结，但杨旭为了替长江说几句公道话，才张开嘴巴，就被“呛”了几口水，这倒是实情。——怎么样呢？“杨家将”，够“呛”的吧！

然而好谈兵的杨旭，不会不懂得“知己知彼”乃兵家至高的信条。因而他不会看不到人家的腰杆多粗而自己的笔杆多细，因而他又不会毫不识相的。这里只要看看他先后两个报告文学集的书名，从《检察官——汤铁头》到《流星》，前者何其沉重，而后者又何其恍惚。或许又是我的臆断，此中似乎泄漏着他内心深处的某种微妙信息。当然是潜意识地、不自觉地，他完全可以摇头作惶惑莫解状。而我，也不是什么心理学专家，为免被指作深文周纳、望风捕影，所以还是绕开这点为宜。

至于这个集子，我一页页翻读下来，还不曾有什么吃亏上当之感。出我意料的是杨旭竟把绿芜少作的残篇断句，几次引入《流星》一文中，让它跟那个在逃十七年的“罪犯”相伴随，两者倒出奇地投合无间。绿芜者何人？乘此机会让我在这里公开“投案自首”吧，即三五少年时之敝人是也。所以我深知那些残篇断句，虽如不可收拾的破碎的镜片，闪烁看星星点点的早已逝去的青春萌动期的某种隐秘或非非之想，却断断不是劣迹和罪证的。

是谁的巨掌，谁的力量，
硬把我们投进了，
跟自己的意愿
背道而驰的车厢？

宁愿我如一朵云，
销熔于落日以西的方向，

每个缥缈的归梦。
或如殒落的一颗星，
莫问自己的行程……

当我读着杨旭追踪那颗在逃十七年的“流星”时，我不由地问自己：我是谁？我不就是那颗“流星”吗？我不也像个“逃犯”似的，从不断的“风云突变”中逃着，逃着；谁知现在是否仍在逃，逃……我甚至还埋怨写这篇报告时的杨旭，怎不问问他自己的行踪？太像个完全受制于理性判断的复查案件的工作人员了。

然而，我是错的。一个报告文学家怎好跟他追踪的“逃犯”一道“逃亡”而去呢？就像对于作者的那篇《三峡梦》，我们不应指望作者也直接滚进那些梦里再像梦，而是要求他站在梦外，冷静地看梦、解析梦、破译梦。在这一点上，杨旭是大可信赖的，他奉献给读者的，当然是文学，但，更是以史笔写出的忠实的报告。

好了，我越说越显得正经起来。我终于还不能借着写这《序》的机会，好好地笑一番，嬉皮笑脸一番，现在还学不成功这一套。

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，夜，南京

目 录

序.....	忆明珠(1)
大江东去.....	(1)
三峡梦.....	(67)
一意孤行.....	(99)
借得一轮明月.....	(127)
市长信访接待日.....	(139)
流星.....	(156)
附：寻觅“流星”的轨迹.....	(239)
后记.....	(242)

大江东去

1985年5、6月间，我沿着长江作了一次漫无边际的旅行。《话说长江》刚刚播映完，我却并未注意到它有一位总顾问，在出发时，我脑子里还没有林一山这三个字。

在武汉，作家成绶台接待了我。他是国务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^①的宣传部长，是个长江通。一个多小时的闲聊中，他有五十分钟是介绍林一山同志。开始我并未在意，听着听着感到有兴趣了，分手时就后悔没有把谈话录下来，只留下了一点模糊的印象。

参观、游览、采访、阅读资料、谈天说地……沿着万里长江一站站往上游走，脑子里灌满了林一山的名字。一个可敬的、使人怀念的老同志。但我仍然没有准备去写他。

回到南京后，整理资料，偶然翻到一副韩愈的诗联：业精于勤荒于嬉，行成于思毁于随。想起来了，这是林一山在1949年的夏天写下的。写文章、选题材往往有个触发点，或一故事，或一细节，或一人物的遭际，有时甚至只因一句并

① 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主任由周恩来兼任，其办事机构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（简称长办），直属国务院领导。长办有职工一万余人。现已改属水电部领导。

不惊人的语言，却犹如闪电穿云，霹雷击地，使作者浮想联翩，久久不能忘怀，终至进入欲罢不能、非写不可的境地。

林一山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是北师大学生，地下党支部书记，抗战兵兴，他以书生从戎，参加了胶东根据地的建设；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已经是辽南省委书记兼辽南军区政委，是一个有一定经验和地位的党的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了。1949年夏天，林一山南下广西，途经武汉时奉命雷下，党派他去管理长江。当时，许多老同志对这个变动忿忿不平，叫一个省委书记去接收旧政府的“扬子江水利委员会”，是到清水衙门里去坐冷板凳呀！

林一山却毫无怨言地去上任了。他在办公室的玻璃板下铺上韩昌黎的那副名联，生活和思想上的大转折开始了。仗打完了，要搞建设了，需要从头学习了。“业精于勤”，必须目无旁顾，来不得半点儿戏的。

关于林一山，耳朵里片片断断地灌了不少，却只在武汉见过一面，一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儿，圆脸大脑门，戴一副深得不能再深的近视镜，75岁高龄却精神矍铄、思路清晰、十分健谈。他送给我一本刚出版的《河流辩证法与葛洲坝工程》，这是他三部治河专著中的第二部。

想要写报告文学，凭这一点印象是远远不够的。于是，在1986年的春夏间，我又作了第二次长江之行……

中南海的寒夜

夜深时，西华厅里热度很高的会议结束了。

1970年12月16日，周恩来总理召开了葛洲坝工程讨论

会。国家计委、建委、水电部、交通部、财政部、一机部以及长办、湖北省革委会、武汉军区、葛洲坝工程临时指挥部的领导人如云而集，济济一堂。讨论重大的工程建设项目，与会者却绝大部分是穿黄军装的，只有三两个穿便服的夹在其间，反显得不协调了。

人们兴奋地交谈着，纷纷离席，退出会场。在一个背光的角落里，端坐着一个穿着蓝棉制服的小老头儿，沉默不语，似乎还不准备离座，他就是林一山。这情景，被湖北省革委会主任A注意到了，他穿过人群，大度地伸出了手，说：

“林一山同志，你是专家，葛洲坝工程上马，还要借重你啰！”

纪登奎副总理过来了，他说：“林一山，鼓起劲头来。你们俩是几十年的老搭档嘛！”

林一山站了起来，向A主任伸过手去。“对，老伙伴，也是老对手。”两只握在一起的手却都是冰凉的。

大军区司令不耐烦了，在门口喊：“行啦行啦！有话到武汉再说！”

西华厅的灯熄了一盏，又熄了一盏。

林一山还坐在那里，似乎是没有力气站起来了。他只作了十几分钟的发言，却已经耗尽了全部精力。要不是周总理指着名要他发表意见，他本来是不想讲话的。在一批真军人假军人热火朝天群情激昂的气氛中，一个才离开“牛棚”的老百姓站出来唱反调，真像是“螳臂挡车”，有点可笑。他还是讲了，他主张先建三峡工程，至少是要在三峡一期工程完成后再兴建葛洲坝，那样省钱、省力、困难也少。先建葛

洲坝工程困难很多。他尤其不赞成在没有初步设计的情况下匆促上马。他的不识时务的发言被一片慷慨激昂的声浪淹没了。说了也不后悔，只是感到沮丧，心里发凉。

服务员把他的大衣送来了，另一位服务员正等着关闭最后一盏吊灯。这时，周总理送走了客人又折回来了。他披着大衣，半抬右手向服务员打了个招呼，径直向林一山走去。林一山赶忙站了起来。周总理在他面前站定，双手扶着椅背，说：

“林一山，夏天我约你来谈谈，后来发生了许多事情，没顾得上来。听说你在北京等了很久，委屈你啦。”

林一山说：“总理忙，我心中有数。”

总理问：“刚才，你没有把话讲完。是吧？”

“再说下去，千军万马就要从我身上碾过去了！”

“还是应该讲。我喜欢听你的意见，就因为你总是讲真话。你坐，坐下吧。”周总理双手交叉在胸前，轻轻踱着步，又问：“这可是在长江干道上修第一座坝，对工程本身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总理，”林一山又站了起来，“你应该会记得的，在南津关建坝的设想，我们是在1958年提出来的。那时，苏联专家组还在长办，三峡坝址的争论还没有结束。美国萨凡奇博士把坝址选在南津关，苏联专家起初也赞成南津关方案。探查的结果，南津关地区是石灰岩，地质状况不好，我们主张在三斗坪建坝，因为那里是火成岩，地质条件十分理想。可是，也有个问题，从南津关到三斗坪，四十公里长的西陵峡航道就得不到改善，万吨级船队无法通过，成了一段

碍航的盲肠。后来，又在南津关外找到了葛洲坝，我们主张在那里建一座低坝，作为三峡大坝的反调节航运梯级装置，航道改善了，还可以收回失去的十几米水头。按照这个规划，葛洲坝工程是要等到三峡工程后期才做，研究的深度还远远不够，我确实无法讲具体意见。”

总理想了一下，又问：“会重复丹江口的挫折吗？”

“不一样，丹江口工程设计没有问题，施工出了毛病，后来总理纠正了，现在的工程质量是好的。葛洲坝还没有作初步设计，连地形勘测、地质钻探都作的很不够呢。”

“呵——”周总理深深吐了口气，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写个书面意见，明天交给我。”

“还有这个必要吗？”林一山想起方才会上的情形，大军区司令和省革委主任，一文一武已夸下海口：葛洲坝工程质量出了问题，把脑袋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以谢国人！

周总理坚持说：“我把你的意见作为报告附件，一起呈送主席。怎么决定，我们听毛主席的。”

走出暖融融的西华厅，林一山禁不住一阵寒颤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忽然想起了1954年的夏天。长江遇到了本世纪最大的洪水，他向国务院紧急报告，要求启用落成不久的荆江分洪工程。当天晚上，李葆华同志来电询问：

“老林！荆江分洪工程要开闸？”口气是焦急的。

“有可能呵！”

“淮河上的运河集水闸垮了！荆江闸有把握吗？”

“没有问题，修了闸就是为防洪用的！”

是啊，人想治水，水也要治人的。怎么想起这些垮不垮

的事呢？真是不祥之兆。林一山把大衣紧了紧。北京——1970年的冬夜，真冷啊！

丹江口！丹江口！

1954年12月中旬的一个傍晚，林一山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通知，要他立刻赶到汉口车站。

当林一山被引进一辆专列时，毛泽东同志、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已在会议车厢里等候了。一一握手，简单问候之后，毛泽东同志开门见山，要林一山汇报三峡工程的建设问题。周总理说，主席从汉口去广水，有三个多小时的行车时间，你要把三峡问题汇报完。林一山立即意识到，这是一次工作汇报，不像1953年在“长江”舰上陪同那样时间充裕，随便松快。他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思路。

毛泽东同志提了个问题：做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在技术上是否可能？林一山说：“如果中央要求在较早的时期内建成，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，是可以完成的。”毛泽东同志又问：“你的根据是什么？”林一山说：

“目前苏联正在建设的水利工程，在规模上、技术上与美国已建成的工程相差不多。美国的萨凡奇博士有信心兴建三峡工程，应该相信苏联水利专家同样有这个水平。”主席又问：“如果不用苏联专家帮助呢？”林一山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们自己也可以建成。但时间要长一些，需要在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成以后。”

林一山的自信，显然给几位领导人留下了印象。他们交换了一下目光，少奇同志说：“你讲具体一点。”

林一山介绍说：光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，目前就有二百八十多位工程师，一千多名技术员，各个专业的技术力量基本配套齐全了。但我们还缺乏修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实践经验。汉水上的丹江口工程如按大坝蓄水位170米方案修建，不仅是目前长江流域最大的工程，在世界上也称得是第一流的工程了。我们取得了丹江口工程的经验，技术水平会有很大提高，就可以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任务。

听了林一山的说明，三位领导人点头表示同意。接着，话题又回到三峡的地质情况、水文资料、工程规模等问题上，不知不觉中列车进入广水车站，已是深夜十点多钟了。周总理对林一山说：“行啦！汇报完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毛泽东同志却兴犹未尽，他说：“不用走啦，我们聊天吧！”于是，林一山继续留在专列里，同三位领导人一起，围绕着长江治理、资源开发，开始了一场比在“长江”舰上更为自由活泼的“聊天”……

是否先建丹江口工程，在当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。作为向三峡进军的序战，为了解决鄂、豫、湘三省的电力需求，在别的支流上也可以做工程。长办之所以主张先建丹江口工程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：一是汉江出水口是个瓶颈，泄洪不畅，三年两灾，汉水下游一万七千平方公里良田年年处于洪水威胁之下，建立丹江口大坝是治理汉水的关键工程；二是为南水北调的中线方案打下基础，丹江口水库蓄水高程如达到170米，就可以经南襄古道自流输往华北地区。当时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经在考虑南水北调了，这是一个有伟大战略意义的问题。

1958年，位于汉水上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，经国务院批准上马了。工程设计是由长办负责的，林一山正在考虑前方设计代表处的人选。

对工程师来说，参与重大工程的设计施工，是人生最大乐事。负责工程设计的丹江口设计室主任魏廷琿、副主任洪庆余都希望到第一线去，他们都是能干的高级技术人才，都能胜任其事。林一山却偏偏选中了文伏波。

文伏波工程师，戴一副秀琅边的近视镜，身材高大却温文尔雅，脸上整天挂着憨厚中略带天真的微笑。文工无论到哪里都有人缘，是个招人喜欢的人。他是湖南人，少年时就读于有名气的长郡中学。他说，有位地理老师的课讲得特别好，《地理概论》给他的印象最深，这就决定了他的一生。中学毕业时，他报考了中央大学和湖南大学水利系，都录取了。

他选择了中大。水利系主任是著名的水利学家徐锴。徐老先生第一次见到文伏波就风趣地说：“一看你的名字，就知道要学水利的。”二十年后，周恩来同志也在他的名字上开玩笑说：“你叫文伏波，可不能到越南去。我国东汉时有个马伏波将军，征服过越南，人家对这个名字很反感。”名字其实是他父亲起的，同水利跟越南毫不相干。

林一山派文伏波去丹江口，在知人善任上可算得人木三分。丹江口工程由王任重同志代表中央抓总，林一山负责设计，湖北省长A管经费与施工。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从来是对立面。他对A省长的特点很了解，今后矛盾与磨擦是不会少的。文伏波为人随和，但在工程技术上是十分细致认真

的。于是，文伏波以副总工程师兼设计代表处处长的身份，扛着行李到了汉江中游的均县，在一片荒山野岭中安营扎寨了。这一去整整十一年，命运注定他将与丹江口工程的成败利弊、甘苦荣辱紧紧拴在一起了。一阵子受表彰，一阵子挨批判，有时像大将军似地在图纸上挥笔签字，有时跟劳改犯一样下伙房烧火……十一年，青丝将化为白发，憨厚的微笑将变作痛苦的叹息……

好脾气的文伏波，对困难是有思想准备的，却没有料到一上工地就陷入了困境！

按照计划，要进行一年施工准备。可是工程指挥部在A省长的支持下，敢想敢干，决定要当年上马。文伏波认为暂时还不具备动员条件。黄河上的三门峡工程是苏联的设计，苏联专家指导施工，苏联的设备成套搬过来。丹江口工程一切要自己动手，真正是白手起家。科研设计已经完成，但施工准备却差得很远。第一期工程是搞右岸围堰，水下有二米厚的卵石层，为防止渗水，必须打钢板桩，订货未到，也没有大型抽水设备。文伏波的意见在指挥部里十分孤立。A省长是坚决相信群众的，他说群众中间有能人，只要发动群众就一定会有办法。

“能人”果然站出来了。技术员杨明堂提出了“以土赶水”的新方案，办法是把整个围堰地区用土填起来，然后再一锹一锹开挖，形成围堰工地。文伏波粗略地计算了一下，要填一百万土方！这是根本做不到的。于是指挥部就开会，批崇洋保守思想，用大批判为工程开路。

当年9月，举行了开工仪式。施工队伍还没有上来，先

动员来几百个机关干部和附近的老百姓，开工大典执行如仪。A省长和林一山都来参加了，林一山不无讥讽地笑着说：“好哇！敲响小锣，招来观众，猴子先爬上杆，戏就算开场啰！”A省长也不示弱：“大戏在后头哩，你等着瞧吧！”

热火朝天的飞跃开始了，丹江口工地的大戏也跟着开场了。9月末，十万大军上工地，坡上沟里到处搭起了席棚，芦席供不上，很多民工只好风餐露宿。人们热情洋溢，热气腾腾，再苦再累也不怕。高音喇叭高唱进行曲，广播员激动地朗诵着振奋人心的诗歌：我就是玉皇，我就是龙王，喝令三山五岳让路，我来啦！……

小车推，扁担挑，“以土赶水”赶了十多天，干不下去了。小小挫折决不能影响改天换地的斗志！原定工期五年，改为四年，又跃到三年、二年以至一年！技术员杨明堂成了工地的大红人，“土法上马，以土为主，先土后洋”的口号深入人心。A省长在欢呼声中视察工地，发表了感情激越的演说，他号召全体职工在全国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，鼓足干劲，大干快上；他把口号进一步升格为“土法上马，以土为主，一土到底”；他要求大力表扬先进人物，批判保守思想，踢开绊脚石。于是杨明堂的事迹上了报纸，进了电台，出足了风头。工地上演出了自编自演的反保守戏剧，戏里的反面人物一看就知道是文伏波。

A省长是位很有魄力的领导干部，善于在举手投足之间造成万马奔腾的局面。工程指挥部成立了右翼兵团和左翼兵团两个司令部，两路大军齐头并进，要在来年汛期前从左右两岸创造“水漫金山”的人间奇迹……